

教育角度

「把孩子教好」—— 性傾向歧視立法爭論的教訓

蔡寶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一個教學的小故事

不久前，兩位碩士一年級的研究生在指導課上向我提出一個疑問：她們修讀女性主義課程不久，就覺得班上有種壓力，似乎同學中如果有人不接受一些邊緣群體，如同性戀者或性工作者的話，就被視為不了解女性主義。兩位同學剛接觸女性主義，對各種問題的思考還未成熟，這種壓力為她們帶來某種不舒服的感覺。

我對她們說，學生能夠坦誠地向導師提出心裏的疑惑，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證明她們對我很深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她們有勇氣去面對在學習過程中所引發的真實感受，這是學習者難能可貴的質素，因為一個人能直接面對、而非迴避種種智性或感性層面的挑戰和不安，繼而作深入的探索、疏理，這樣，真正的學習才會開展。

基於此，我鼓勵兩位同學回到班上主動向老師和同學表達她們的感覺，嘗試與她們作坦誠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要做到這點，首要的條件是班上要有相互信任和包容的氣氛。我告訴她們說，在我的經驗裏，女性主義學習者大多數都有包容不同見解的胸襟，和願意挑戰自己既有想法的勇氣，所以，她們是

不用擔憂的。如果不幸她們班上的氣氛並非如此的話，那麼就算她們倒霉了。

我深信真正的教育建築在師生間深厚的互信基礎之上；只有如此，學習者（包括老師自己）才有勇氣去面對思想和情感上的挑戰，更可以在差異中開展對話，尋求共識。反觀今日社會上有關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爭論，我覺得這種有利於青少年以至社會大眾教育的基礎並不存在。

有關性傾向立法的爭論：「明光社」反教育的自我封閉形態

爲了回應「國際人權公約」對簽署國的要求，香港政府早於十年前，即1995年間，已經就各種反歧視的立法部署，結果通過了性別、家庭崗位及殘疾歧視的法例；種族歧視立法尚未完全通過，但也可算在順利進行中。唯獨是性傾向歧視立法，卻由一開始就遭受教會強烈反對，而當時殖民政府就以「諮詢及教育」爲名暫緩立法。不過，到了2005年的今天，特區政府不得不舊事重提，結果遭到教會組織明光社激烈的反對。明光社不但在各大報章刊登連篇累牘的廣告，更有個別教會在各中、小學鼓勵學生向民政事務署寄出預先印製的「一人一信」，表明自己反對立法，意圖製造一個強勢的反對聲音，阻止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明光社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姿態，就是拒絕與他們立場觀點不同的人對話。他們認定了同性戀是罪——這是一個絕對的、不可更改的立場，因爲他們認爲這立場源於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在這種絕對的觀點下，任何真正而深入的溝通都變得不可能了。根據教育觀點，這是十分可惜的，因爲真正的教育，非要有真正而深入的溝通不可。

教育的本義——交流與多元共融

Judith Simmer-Brown 是美國一所著名佛教學院——Naropa Institute——的宗教研究系系主任。她畢生致力於破除宗教隔閡，促進宗教對話與共融。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她提到熟悉的美國教育，如何不利於這種對話與共融。她說，在美國的本科和研究院階段裏，她所學會的，是去「學習別人的理論，以便建立自己的理論，然後去堅守這個理論或固定的觀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就是找一個新理論，然後花整個學術生涯去堅持並捍衛它。」¹

相信唸過大學（尤其是研究院）的讀者看到上述句子都會發出會心微笑吧！學習的精力如此浪費在捍衛自己的觀點與偏見之上，因此白白錯過了如實地體驗和觀察主觀與外在實況的機會，也錯過了真正的思想交流。沒有交流與對話，教育就不可能發生，更遑論多元共融了。

要學習就是要「不確知」

明光社堅持一個他們認為是神授的觀點，就是「同性戀是罪」，因此在這立場上拒絕任何對話與交流。誰知堅持「正確觀點」的態度，正是教育的最大障礙，因為要學習就要願意「擁抱不確知」（Simmer-Brown 原文是 to embrace ambiguity）。Simmer-Brown 往下說：「（要願意容忍）極度的不確定狀況，就是不知道，就是試驗，就是飄浮不定。擁抱不確知是教育經驗所必需的。」²

進一步說，學習者能夠接受「不確知」的狀態，就可以從容面對陌生的想法、事物或文化，那就是文化研究所說的「他者」。陌生的人和事、陌生的思想等等，從來都使人感覺受威脅的。據Simmer-Brown 說，如果我們能夠從容面對這威脅的話，對話就可以開始，多元共融的世界就變得有可能了。

面對陌生人就是面對自己、建立連繫

爲甚麼陌生的人和事會如此具威脅性呢？Simmer-Brown 引導我們想深一層，原來「他者」往往爲我們帶出潛藏於自己文化或個人內心世界的陰暗面和種種矛盾不安；用她詩意的語言說：「當我們面對『他者』時，我們同時要面對（自己）社會的隱蔽傷口及其殺傷力。」³ 在這關頭，我們往往選擇不去面對自己；相反，我們會把自己內在的陰暗和矛盾不安投射出去，而陌生人——他者——就成爲我們疏遠及恐懼，甚至是憎恨的對象。其實他們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因此，認識陌生的人和事，不僅僅是擴闊自己的胸襟、接納他人而已，而是透過充分掌握「外人」和「外物」的內涵，反過來更深入地認識自己，與自己建立知性及感性的連繫，不迴避自己、疏遠自己。這樣才可以超越自己，達到學習的真正效果。

要面對自己，與自己建立深入的連繫，當然要有很大的勇氣。在過程中，我們會不安、不穩，甚至憎惡或沮喪等等情緒。不過，願意付出這些代價的人，只要能忠於自己、忠於自己向善的追求，我相信是會有回報的。這回報不單是個人質素的提升，更是整體社群多元共融的建立，一個「社區連繫」（sense of community）的建立。

與 Simmer-Brown 文章所在的文集收錄了另一位學者 Parker Palmer 的文章。他的一個學習經驗大概可以引用來說明這點。在 Palmer 的大學時代，爲他們一班同學講授納粹德國歷史的教授都是資深學者。不過，他們講述這段歷史的手法，讓他感到極度的疏離，彷彿「這些恐怖的事物，是在另一個星球，另一個物種發生的事。」⁴ 換言之，教授把這段真實的人類歷史完全物化和外在化，平白錯失了帶領學生深刻反省——反省人類社會以至自己——的機會。「因此，我有著道德和靈性上的

缺陷。」⁵到他經歷了很多人生痛苦之後，他才恍然大悟，其實他身處的二十世紀美國社會，甚至在他居住的小社區裏，族群之間也互相猜忌。納粹德國史的學習，早應該讓他體會到自身的真實處境，也應該讓他看清楚，原來族群間的仇恨不獨在納粹德國存在。從更深層次來說，納粹德國史也應該讓他看清楚，原來自己心靈深處也隱藏著邪惡的力量——「一個小小的希特拉」⁶。教授沒有讓他體會每一個人，包括筆者自己，在面對挑戰自身價值或信仰的「他者」時，都會毫不考慮把別人的立場抹煞掉，雖然用的往往只是言語，而非槍彈和毒氣室。

把孩子教好，讓他們建立連繫

今天香港這場有關性傾向立法的爭論，促使我們對教育的本義作一個深刻的反省。我相信教育是促進自身及他人的了解，因為只有通過了解，我們才能超越自我，與別人交流對話，鞏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一個更完善的社會。

1 Judith Simmer-Brown, “Commitment and Openness: A Contemplative Approach to Pluralism”, in Steven Glazer (ed), *The Heart of Learning: Spirituality in Education*,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utnam, 1999, 105.

2 同上。

3 同上，102.

4 Parker J. Palmer, “The Grace of Great Things: Reclaiming the Sacred in Know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Steven Glazer (ed), *The Heart of Learning: Spirituality in Education*,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utnam, 1999, 25.

5 同上。

6 同上，26.